

我们很饥渴,我们很惆怅

2014年11月26日,陈佩斯现身水立方。这一次他不是走穴表演,而是宣布自2014年6月启动的“京禧原创喜剧剧本征集”活动结果:80部参赛作品中,仅评出一个三等奖,一、二等奖都空缺。

唯一的三等奖给了剧本《闹洞房》,作者是一名“70后”女编剧。剧本讲的是两个年轻人要结婚,可是没钱买新房,只能借用别人的房子,由此引出无数可能性。

是陈佩斯太挑剔吗?是,又不是。

半年征集,一共收到67个完整剧本和十几个故事梗概。陈佩斯只挑出了三个感觉不错的,其中较好的便是《闹洞房》。“另外两部作品,其中一个题材太陈旧,脱离了时代,像十年前写的;另一个借鉴了一部国外经典喜剧剧本,这虽然是个好想法,但作者显然没有强大的能力把它完成。”

于是,陈佩斯感慨:出十万元寻觅一部好剧本,竟也这么难!

说起陈佩斯,观众对他的印象,恐怕还停留在春晚。1998年,陈佩斯梳着马辫,涂着红彤彤的脸蛋,憨傻地拉着王爷朱时茂,在舞台上一遍遍地遛圈。谁也没想到,这竟是他在春晚舞台上最后的形象。

这十几年,陈佩斯专心做话剧。还是光头、布鞋,还是一脸憨笑,往那一站,便是笑声。

陈佩斯从演员变成了导演、编剧。当年的豪情壮志言犹在耳,喜剧剧本创作却遭遇了最大的难题。“现在的人都浮躁,坐下来写剧本得很困难。每年电影学院、戏剧学院报考表演的人成千上万,但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,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。”

陈佩斯玩的喜剧相对小众,但这些年来,从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,到湖南卫视的热门综艺节目《我们都爱笑》,喜剧出了不少,但能让我们笑出来的又有多少?

文化人

齐鲁晚报

B07

编辑:陈熹 美编:石岩 组版:刘燕

一周一娱

陶宗震: 纠结一生的 功臣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2015年1月7日,设计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老人陶宗震,带着毕生的光荣走了,享年87岁。而让他牵挂一生的“梁陈方案”之争,似乎也有了终结。

陶宗震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自豪,一是在1958年国庆工程时,他负责天安门广场规划及人民大会堂选用方案及初步设计;第二便是他师从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。

或许人们会问,在那个时代,为什么负责设计天安门广场的不是梁思成,而是他的学生?这或许要从争议半个多世纪的“梁陈方案”说起。

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,陶宗震正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三年级学习,修习老师梁思成讲授的五门建筑课。那时,梁思成已经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,在英国建筑界享有盛誉的陈占祥出任北京市委企划处处长,与梁思成合作北京“新市区”规划。

两人联手后不久,便推出了他们具有前瞻性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——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》,即“梁陈方案”。方案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出北京古城,将北京变为“双城”,把钓鱼台、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。

这一方案在60多年前可说颇为超前,梁陈两人甚至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城市拥堵、新旧城保护与发展预留了空间。陶宗震也参与起草了这份方案。

不过,与“梁陈方案”竞争的是来自苏联专家的方案。为了打造东方“布尔什维克”首都,苏联专家建议了今天可供人民游行以备检阅的天安门广场、沿长安街的行政机构。为此,北京古城需要拆迁改造,甚至需要拆毁故宫,此举后来被周恩来总理制止。

那个年代,在专业上绝对服从苏联专家是政治任务,最终苏联专家的意见占了上风。

1958年,作为梁思成的学生及“梁陈方案”起草者之一的陶宗震,在两种设计理念之间做出了自己的“抉择”:他在苏联专家建议以及高层直接过问的基础上,着手设计了今天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。在随后的日子里,陶宗震成为设计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功臣,而他的老师梁思成却仍在为“梁陈方案”的科学与合理性据理力争,直至被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中。

或许是纠结于当初有悖于老师理想的选择,陶宗震在成为功臣之后的大部分人生中,都在为老师梁思成“正名”。在1989年纪念营造学社60周年大会上,陶宗震再次重复其“梁思成不等于大屋顶”的观点,认为将梁思成划定为复古主义者、原封不动地保留北京旧城的说法是错误的。

另一方面,陶宗震也希望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作一些辩解。在2014年5月的一份《中国建筑报》上,陶宗震曾撰文批驳为“梁陈方案”叫好的声音:“1983年元月,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同志与我谈到北京的规划建设时,转述一位领导同志的话:‘悔不听当年梁先生新北京的意见。现在把北京搞乱了。’对此我感到很惊异,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。”

陶宗震认为,从完整保留下来的“梁陈方案”原件判断,其庞大的占地面积,不但当时不可能实现,即使今日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,仍然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中央机关行政中心建筑群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,在北京日益拥堵的车流久治不愈,以及旧城保护与国际化新城开发这一绝对矛盾爆发多年后,梁思成的又一位学生吴良镛与弟子吴唯佳,参照“梁陈方案”的规划理念,设计了今天广为人知的京津冀一体化方案,将部分行政功能迁出首都北京,这一方案已获多方认可。

或许真理只有时间可以验证。

“巧妇”陈佩斯难为无米之炊

喜剧,沉重的石头

第四届北京喜剧艺术节筹备一年,没逗乐观众,还弄得发起人陈佩斯愁眉苦脸。他原打算充一回土豪,拿着大把的银子广征优秀喜剧剧本。结果,征来80个,只评出一个三等奖。2014年12月喜剧艺术节展演,只演了三部。

难道真如柏杨所说,中国人不会笑了吗?可你往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的剧场里看,所有人都不都笑得前仰后合吗?问题是,那些制造笑料的人哪儿去了?

本报记者 贾凌煜



我们都爱笑,只是缺少笑的突破口

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喜剧故事。一个是喜剧大师卓别林跟一头驴在一起。驴老咳嗽,他想给驴喂药水,但是驴一再吐出来。于是,卓别林想到了用管子给它吹进去。没想到在吹的同时,驴突然咳嗽,结果药水全到了卓别林的肚子里。另一个故事与这个如出一辙,是讲给大象喂药,结果弄了自己一脸,因为大象先吹了口气。

这两个故事一直在表演艺术家姜昆的脑海里。“中国喜剧市场非常大,但现在被一些质量不高的内容充斥着,这应该改变。这两个故事虽然简单,却有巨大的‘笑果’,这就足够了。”

姜昆与导演兼主持人刘仪伟住同一栋楼。有一天下楼时,姜昆碰到了刘仪伟。被问及是否看过《泰囧》时,姜昆谈了自己的三点想法。

“当时我说,第一,它太成功了,能把李安的电影挤出中国;第二,太另类了,相声包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,但这个电影都在意料之外,没有情理之中;第三,中国的喜剧观众规模还没有形成。”

喜剧观众未成规模,印证了我们都爱笑,只是缺乏笑的突破口,这正是编剧们最头疼的问题。

“让人哭容易,可让人发自内心地笑,太难。”《泰囧》编剧束焕说。现在观众对有规律的东西已经非常熟悉,只有当剧中情景形成一种社会心态的东西后,才会引起观众的笑声。

喜剧是聪明人下笨功夫

当年重返话剧舞台时,陈佩斯曾说过:“当你抖了一个包袱,观众笑了,你满足了。当潮水一般的笑声涌过来时,你再把新一轮包袱扔出去,它再回来……这事太享受了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,比喜剧更能带给演员那么多快乐。”

如今,潜心创作的舞台喜剧《托儿》和《阳台》成功上演,让陈佩斯更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。

然而,越是坚守,陈佩斯越是忧心。这不仅源于喜剧创作荒,也源自人才荒。

在我国,专业艺术院校开设音乐表演、戏曲表演、影视表演,唯独没有喜剧表演,更没有喜剧院系。喜剧教育的缺失,使得喜剧艺术长期存在发展瓶颈。

正因如此,陈佩斯一直活跃在喜剧教育一线。理论课上,陈佩斯以严肃著称,动辄讲到上下五千年;实践课上,他则常常现身说戏,不论是农民工、处长、悍妇还是小三儿,各种角色都是信手拈来。

对角色的理解靠的就是演员的悟性,只有根据剧本结构,在舞台上带着观众玩进玩出,才算成功。有悟性的演员,对于喜剧剧本创作也有独特的理解,比如陈佩斯。

“对《阳台》的剧本,我不知道发呆了多长时间,呆到自己都快傻了。喜剧剧本的创作,完全就是自己折磨自己,自己跟自己对抗。一个剧本结束后,又得一切重来。”陈佩斯不是科班出身,同样不是科班出身的编剧还有四成多,他们依旧走在写剧本的道路上。每次写一部剧本都是翻一座山,如果看着山发憷,最好的办法是撤退。但是只要做了,就有自己的所得,这条路走了,就有收获。

席勒说过,当人游戏的时候完整,当人完整的时候游戏。其实,喜剧就是聪明人下笨功夫。演员也好,编剧也罢,莫不是如此。